贫贱江头自浣纱
记父亲与丰子恺先生

陶洁

1935年丰子恺画《贫贱江头自浣纱》赠陶亢德。作者供图

同去看林语堂

1982年，我在《新文学史料》里看到一篇丰子恺先生的孩子回忆他们父亲的文章，里面提到丰先生很感激我父亲陶亢德在抗战时期把他在《宇宙风》杂志上发表的一百多幅画从杂志上撕下来寄给他，为他保存了画稿。趁去上海复旦审稿之便，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父亲。他很激动。他一辈子颠沛流离坎坷困顿，很少听到别人的赞扬。他告诉我，丰先生的儿子丰华瞻在复旦大学英语系教书。如果我看见他，一定要谢谢他。丰华瞻老师果然出席了审稿会，但我的道谢却惹了祸，因为他不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气愤之余，他讲了家里的一些矛盾。我回家告诉父亲，他说，他听说丰家为房子问题有些矛盾，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事情。那天晚上，他很少说话，可能还是在思考丰家儿女之间的问题。

父亲在晚年写的回忆录里提到很多人，对大部分人都有些微词，但对丰先生却很敬重，甚至反复说有两件事情对不起他。一件是关于丰先生第一次来我家。因为父亲喜欢熬夜干活，丰先生来时他还在睡觉，母亲只好让丰先生在房门外等了一会儿。其实，这不能算是大事，因为丰先生并没有事先通知父亲。但他觉得他失礼了。1943年，他在《贫贱江头自浣纱》里满怀深情回忆这位大力支持他的编辑事业、姓"汇丰银行的丰的子恺先生"时没有忘记自揭己短，描写了他们初次见面时的尴尬场面：在老先生"枉驾"我家时我还"高卧未醒"。过了四十年，父亲写回忆录时，在《贫贱江头自浣纱，纪念丰子恺和徐訏》一节里，他再次提起这件事——

"我对丰子恺先生有两件事情一直觉得抱歉。一件是他来访我，其时大概为三十年代中期。我是迟眠迟起的人，他枉驾时我还高卧在床，忽然老妈妈报告有客人来，可恨我只租着一个客堂间，那是不过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兼作卧房客厅餐室书斋。我赶快披衣拖鞋跑出房门一看，但见一位相当瘦长衣穿朴素的中年人肃立在房门外面靠右侧的地方。这位客人我其实并不认识，但立刻恭请入室。坐下敬茶之后，才知道他是丰子恺先生。他面色有些灰青，我想大概是他素食的结果。他的文章他的画，我早在《小说月报》上拜读过，敬佩有素，现在竟蒙枉驾过访，我怎不更加多说多话了。

"丰先生后来叫我作向导去看林语堂。林的寓所位在七拐八弯的一块地方，单凭什么路多少号是很不容易找到的，因此我想丰先生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原故才来看我的，否则他同林语堂相识很早，要去看他何必要我领路？但这极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根据后来我对丰子恺风格的观察，十有八九是一则两便的作法，因为他虽同林早认识，但未尝到过他家，而且出于礼貌所以先来看我，他原来并不是说'喂，你陪我去！'而是说'一同去看看他好吧'的。"

虽然父亲记忆有误，把叫醒他的人从"妻（我母亲）"变成了"老妈妈（我外婆）"，但他歉疚之心依然如故。他在另一节《缘缘堂在天之灵》里把这次晤面交代得更加详细：

"他坐了一刻要我同去看林语堂。他曾为林编开明英文读本画了一些插图，'真出意外，'他说，'画时虽也讲过抽版税百分之零点几，实在并不想到竟会得到很大的数目。'丰先生好像还说过他在故乡石门所造的缘缘堂费用就用的这笔版税。"

"那天在林语堂家里吃的午饭，林语堂问丰子恺的吃素是为了信佛戒杀生还是为了别的，丰先生说最初是由于闻不惯荤腥气味，和信佛无关。"

错估了《艺术漫谈》的销路

父亲提起对不起丰先生的另一件事情是关于《艺术漫谈》的出版经历。1943年，他写道，"在我和丰先生的交往之中，只有一件事使我迄今对他负疚，那就是人间书屋的出版他的《艺术漫谈》一书。这是一本杰作，当初向他要求出版时，我认为销路大有把握，所以印数既多，装订纸张也特别讲究。谁知出版以后销路奇少，不久战事突起，更少人购此'闲书'，以致所付版税，始终不满百元。我常想要是此书由开明印行，销数当十百倍于人间。他虽绝不言及此事，我却愈想愈觉得负疚于心。"

他在回忆录《缘缘堂在天之灵》一节里说得更加详细："人间书屋出版老舍的书一共四本，本本成功，但印丰子恺先生的《艺术漫谈》却是失败了，就是卖不出去。我印《艺术漫谈》，还特为精印，就是正文用了米色道林纸，封面用硬纸版，封面绿色，书名黑色，字是作者亲笔。我之要印精装本，只由于我很喜欢这书的内容。丰子恺的为人，他的画，他的散文以及他的字，我都爱好。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中，丰先生的散文本是我最爱读的，《艺术漫谈》中的各篇，虽然谈的是艺术，却都是娓娓谈来，读者不论老幼无分雅俗，我认为都必爱读，然后这完全是我的主观，出版之后，购者竟寥寥无几，但是我想这是《艺术漫谈》'投错了娘胎'，它如果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话，销路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这件事情，我对丰子恺先生一直怀疚于心。如果时局平静，说不定后来能打开销路，不幸又偏逢全面抗战，大家逃难流离，《艺术漫谈》只好成了废纸。"也许正是这种歉疚心情使他把丰先生的画稿收集起来寄给他。

父亲反复提起的另一件事是丰子恺先生送他的一幅画《贫贱江头自浣纱》。他说，"三十年代后期，我办过一本译文杂志，每期二三十篇文章，要译四五篇，署一个名好像不太好，遂取了许多笔名，其中之一为江自浣，我既不姓江，自浣之名也显得怪。为什么取这个怪笔名呢？原来有故。那是在三十年代中期，我和徐訏共编《人间世》时，丰子恺先生是经常惠稿的作家之一，他给徐訏和我一人一幅着色的画。送徐訏的一幅题为'游春人在画中行'，给我的一幅呢，题为'贫贱江头自浣纱'。"

父亲反复提起的另一件事是丰子恺先生送他的一幅画《贫贱江头自浣纱》。他说，"三十年代后期，我办过一本译文杂志，每期二三十篇文章，要译四五篇，署一个名好像不太好，遂取了许多笔名，其中之一为江自浣，我既不姓江，自浣之名也显得怪。为什么取这个怪笔名呢？原来有故。那是在三十年代中期，我和徐訏共编《人间世》时，丰子恺先生是经常惠稿的作家之一，他给徐訏和我一人一幅着色的画。送徐訏的一幅题为'游春人在画中行'，给我的一幅呢，题为'贫贱江头自浣纱'。"

这幅画受到母亲的嫌弃，因为自从它来到我家，父亲的遭遇就越来越坎坷。然而，我觉得丰先生送画是有讲究的，我父亲也是明白他的励志深意，因此他遗憾母亲不理解丰先生的苦心，容忍他的"小儿子用铅笔画上了不少大圈圈，大概是他妈妈抱怨一次他就涂一圈"。我认为父亲在写回忆录时寻找过他希望能与他"共存共枯"的画，他没有找到，便以为"给破四旧的拿走了"。其实，母亲的不喜欢使画逃过一劫。父亲去世后，有一年，我在北大图书馆找资料时，无意中发现了父亲的这篇文章，便问母亲，这幅画还在吗？能给我吗？母亲回信说，当年这画被我们孩子们糟蹋得不像样，（她跟父亲看法不一样，她认为是我们大家写大字时把墨摔到画上面了），只好取下来。她随手放进了装杂物的木箱，而木箱是放在楼下的，抄家时没人想到它，因此就保留了下来。她强调这幅画不吉利，我不忌讳的话，拿走就是了。后来我花了高价把画重新装裱，我觉得它佐证了父亲跟丰子恺先生的友谊，值得好好保存。

父亲很感激丰先生在抗战之初写信邀请父亲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全家到他在"石门的缘缘堂居住"，但他更怀念的是他有一年去杭州田家巷看望丰先生。他特别说明，"那一次去杭州，在西湖里的一个寺院里住了几天，那个宿处，就是丰先生代为租借的。和我同去杭州同住僧院的是华君武同志。"

介绍华君武与丰子恺相识

父亲在总结自己编辑生涯时特别提到了华君武先生："《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三个刊物中有千错万不是。可也有它们的一定的业绩贡献。这些贡献影响之大，我在前半生是意想不到的。例如humor一词的定译'幽默'。尽管当时有李青崖的据理力争，拟译'语妙"。钱玄同的戏译'酉靺'，结果还是林译'幽默'获得最终胜利。全国沿用迄今，如无大故，大概可以不朽了的。此外贡献了老舍和《骆驼祥子》，华君武，黄嘉音。"他说，"华君武《论语》刊载他的漫画时，还是一个青年。在一家银行里工作，他不是美术学校出身，画漫画是游戏笔墨，仿佛学的一个在上海英文日报，《字林西报》作画的西人萨帕乔，不但画学他，连签名也模仿似的，他投稿于《论语》，我不懂画的技术，但略知画的意思，觉得这位作者的巧思妙想，高出当时一些已经知名的漫画作者之上（直到现在我看他的技巧依然故我，意思还是费过心血，出类拔萃），因之每稿必登，往往整面一幅。……他是到延安去了，一别四十年，从此连音讯也不通了，在我编《论语》时期和他熟得很了，后来他离沪到延安时到我家通知我妻，连我岳母也知道了，但老太太不明白这是步上革命征途，只知道他将远行，照老规矩，祝他一路顺风，发财发财。还在抗日战争之前，有一次他同我去杭州，住在西湖一个庙里。那是我事先请托丰子恺先生为我办妥的。丰先生那时候寓杭州田家巷十号。华同志同我前去拜访，因而认识了丰先生。他们是同行，介绍人却是我这个漫画外行呢。"

关于这件事情，有过一个小小的风波。1989年5月，有位钦鸿先生在《西安晚报》发表了一篇小文章《华君武与陶亢德》，说我弟弟告诉他，父亲曾带华先生去杭州向丰先生拜师。高信先生看了文章顿生疑窦，写信向华先生求证。于是，5月26日《西安晚报》登了《华君武同志来信》，对拜师一说予以否定。高先生还写了篇介绍全过程的文章，登在了他的《常荫楼书话》。我是在大约2015年决定写些关于父亲的文章后，才知道这件事。可惜弟弟已经去世，无从查证，而钦先生跟我们其他几个兄妹并无联系，也无法寻找。

我看了文章又看了父亲的回忆录，觉得"拜师"一说，确实夸大，但事实真相恐怕也不是高先生所认为的。在此，我想摘录一段华先生的原话："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夏天，暑假我回到杭州家里，某日丰子恺先生和陶亢德同来杭州约我去功德林吃饭（丰先生食素）后，又泛舟夜游西湖，并非为文中所写陶亢德带我去杭州拜师。

"至于陶亢德的孩子陶融，我从未谋面。如果在1934年前后，恐怕也出生不久，因我去《论语》编辑部（陶家即在编辑部居住）仅见陶太太，未见孩子，即使有，恐在襁褓中，何能知我拜师。

"现在，有人写别人历史，或写自己的历史，常不尊重历史事实，这至少是不科学的。"

华先生认为，我弟弟不可能知道他的事情的说法恐怕不是理由。我们家孩子都没见过周璇，但我们从小就知道，我们家曾经跟周璇做过邻居（根据父亲回忆录，我家在《宇宙风》而不是《论语》的编辑部居住，那是在愚谷村20号），夏天大家在后门口一起乘风凉聊大天。我们的母亲还曾发现一条蜈蚣爬在周璇的腿上，提醒了她，使她避免被蜇。母亲每提起这件事，那仿佛救了周璇一命的得意神情至今历历在目。同样，外婆和母亲也以认识华先生为骄傲，我们也从小就知道父亲跟他去杭州住在庙里见到丰先生的事情。我们印象深刻因为我们觉得他们跟那些泥菩萨睡在一起一定很刺激。至于外婆在华先生去延安来我家告别时说"发财"的事情更是我们常常跟外婆开玩笑的内容。华先生的话让我想起所谓的"继承的焦虑"。其实他的画风跟丰先生完全不一样，确实不必拜师，但我们父亲安排两位画家的会面恐怕还是出于一番好意的。

抗战期间，父亲把丰先生发表的画收集后寄给他，抗战以后，父亲没有跟丰先生再晤面。他记述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是在1958年，当时我和他不通音信已经很久，不知道他住在故乡还是杭州抑或上海。但有一位相当熟识的同行罗君是他的学生，有次来出版社看我，略坐就要走，说要去看丰子恺先生，我告诉他我也很想拜望拜望他，想和他同去。罗君当然答应了。

"丰先生住在亚尔倍路的一所弄堂洋房里，那房子是前后双开间的，他似在后间工作，房间的光线很好，主人面色红润，神情给人以精力充沛之感，和我第一次同他相见时很不相同了。如以天气作比喻，当时似乎是阴沉沉的深秋，现在是爽朗的初秋，当时我想解放以后的丰子恺，足以证明解放给知识分子的滋润。

"此后我就无缘再见丰子恺先生一面，只在报上读到过一些悼念他不幸逝世的零星文章，后来又读到《丰子恺传》的末段。这篇文章中有一点使我大为晚年遭劫的丰先生称庆，原来他很能喝酒，只要一斤黄酒，就什么屈辱苦难都不在乎，大有事大如天醉亦休之概，这是极为难得的幸福。"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